

中共湘鄂西蘇區的發展及其內部整肅 （1927-1933）

陳耀煌

摘要

1927年7月第一次國共分裂之後，包括賀龍在內的許多中共黨員返回他們位於湘鄂西地區的家鄉，試圖發動農民暴動。在1928-1930年間，這些返鄉黨員在湘鄂西地區建立了兩塊主要的根據地，一塊是洪湖蘇區，另一塊則是位於賀龍家鄉湖南桑植縣周圍的湘鄂邊根據地。1930年7月，這兩塊根據地合併成湘鄂西蘇區，並由賀龍擔任該蘇區的最高軍事領導。湘鄂西蘇區最初以洪湖地區為中心，中共擬以此地為根據，向外發展。然而，在經歷一連串軍事的失敗後，蘇區內部陷入嚴重的紛爭。最後，湘鄂西蘇區最高黨領導夏曦決定發動內部整肅。殘酷及毀滅性的整肅以及國軍的圍剿迫使中共不得不於1932年9月放棄洪湖蘇區逃往湘鄂邊蘇區，並最終於1933年底被國軍完全驅離出湘鄂西地區。本文試圖探究湘鄂西蘇區的發展與內部整肅的根源及其過程，以及湘鄂西蘇區與其他蘇區的不同之處。

關鍵詞：中共、湘鄂西蘇區、洪湖蘇區、湘鄂邊蘇區、夏曦、內部整肅。

The Development and Interior Purges of Xiangexi Soviet (1927-1933)

Yao-huang Chen **

Abstract

After the split between the KMT and CCP in July 1927, Communist activists including He Long tended to go back to their native places in western Hubei and Hunan to stir up the peasants. From 1928 to 1930, they set up two major base areas in western Hubei and Hunan. One was the Hong Lake Soviet; the other was the Hubei-Hunan Border Soviet around He Lung's hometown Sangzhi County, Hunan Province. In July 1930, these two soviets merged into Xiangexi Soviet with He Lung as its superior military commander. The CCP tried to have a permanent soviet area around Hong Lake and then to expand from it outwardly. However, after a series of fiascos, the Xiangexi Soviet was caught in severely prolonged inner conflict. Subsequently, the superior party leader of the Xiangexi Soviet, Xia Xi, decided to start interior purges. These cruel and decimating purges and the annihilation campaign against the Xiangexi Soviet by the Nationalist Army finally led to the retreat of the Red Army from the Hong Lake Soviet to the Hubei-Hunan Border Soviet in September 1932. Moreover, the Red Army was expelled completely from the western Hubei-Hunan border area by the Nationalist Army in the end of 1933. This article is going to examine the cause and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and interior purges of Xiangexi Soviet, and revea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Xiangexi Soviet and other Soviets.

Keyword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Xiangexi Soviet, the Hong Lake Soviet, the Hubei-Hunan Border Soviet, Xia Xi, interior purges.

** Postdoctoral of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中共湘鄂西蘇區的發展及其內部整肅 （1927-1933）*

陳耀煌**

壹、前言

湘鄂西蘇區是中共於所謂「土地革命時期」（1927-1937），在湖北、湖南西部地區所建立之數塊革命根據地的總稱。根據當代中共官方黨史的說法，早在1927年以前，便有回鄉知識分子黨員在該地活動。1927年國共分裂以後，這些回鄉知識分子黨員在黨的領導下，發動了一連串的農村暴動。1928年初，出身湘西桑植縣並在南昌暴動期間入黨的賀龍，在周逸群等人的陪同下，一起回到湘西地區活動，擬在該地建立一塊割據政權。後來賀、周二人被敵人衝散，分途發展。其中，賀龍在湘西桑植等縣與鄂西施鶴七屬¹地區（以下簡稱「湘鄂邊地區」）拉起紅四軍的旗幟，周逸群則在鄂中南洪湖地區周圍，以當地農民游擊隊為基礎，建立了紅六軍。1930年，兩軍合併成紅二軍團，以洪湖根據地為中心，向外發展。但是，由於受到當時中央左傾「立三路線」之影響，紅二軍團發生戰略上的錯誤，最後不得被迫離開洪湖根據地，轉戰湘鄂邊地區與鄂西北地區。1931年初，夏曦來到洪湖根據地，建立湘鄂西中央分局，時改編為紅三軍的紅二軍團也從鄂西地區返回洪湖根據地。原似大好的發展情勢，卻由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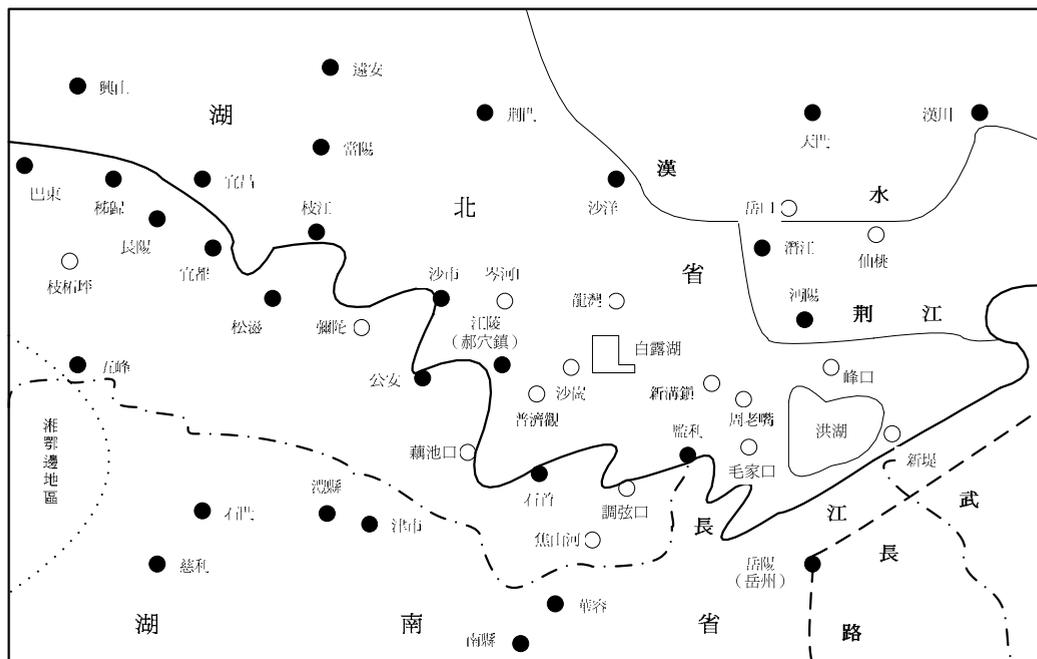
* 本文撰寫及修改期間，承蒙陳永發教授、翟志成教授及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07年3月1日；通過刊登日期：2007年4月26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¹ 有另一種說法稱「施鶴八屬」，指恩施、鶴峰、巴東、利川、建始、咸豐、宣恩、來鳳一帶地區。因中共文件裡採取「施鶴七屬」之稱謂，本文亦從之。

夏曦堅持執行王明的激進路線，並於1932年在邊區內部推動大規模的肅反，給蘇區帶來了極大災難，紅三軍也因此被國軍擊敗，再度被迫離開洪湖根據地，逃竄至湘鄂邊地區，並最終於1933年底被國軍驅離至湘鄂川黔地區，結束湘鄂西蘇區。²



湘鄂西地區圖

這樣的觀點相當熟悉，但難以令人苟同。如陳志讓（Jerome Chen）便不贊同這種看法，他在《華中高地的居民》（*The Highlanders of Central China: A History, 1895-1937*）一書中指出，不應該把湘鄂西蘇區的挫敗歸咎於李立三或王明的左傾路線。據其所言，賀龍很少按照中央所指示的土地革命路線號召農民，他對於分配土地等社經改革政策也相當冷淡。相反地，賀龍是以其個人魅力，以及某些傳統的私人關係來號召動員地方農

² 當代中國官方觀點的代表著作可見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史編寫組：《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史》（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

民。此一策略與華中高地的社經環境有密切關係，蓋該地區的農民大多是自耕農，他們的困境主要肇因於軍閥與政府的剝削和苛捐雜稅，所以階級矛盾並非該地區的主要矛盾，土地革命的口號對於該地的群眾並不具有吸引力。³

陳志讓的觀點確實有許多可取之處，但卻忽略了一個事實，即湘鄂西蘇區的決策者是先後擔任該蘇區最高黨領導的周逸群、鄧中夏與夏曦，賀龍只是一位忠誠的執行者。況且在1932年以前，湘鄂西蘇區的中心赤區並非賀龍的家鄉湘鄂邊地區，而是洪湖地區。因此，過分強調賀龍及其在湘鄂邊地區的活動，無疑是模糊了焦點。那麼，湘鄂西蘇區又是一塊怎麼樣的革命根據地呢？它與中共其他的革命根據地之間又存在著什麼不同？陳志讓所強調的黨員的個人魅力以及傳統的私人關係，還有中共主張的階級鬥爭，又在該蘇區的建立與發展過程中起了什麼樣的作用？再者，1932年湘鄂西蘇區的肅反事件又為什麼會發生？本文擬根據19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所出版且尚未被充分運用的資料，試圖回答上述問題。

貳、自發性群眾抗爭階段

陳志讓認為湘鄂西蘇區與中共在其他地區所建立的蘇區很不一樣，因為前者是依賴賀龍個人的魅力及傳統的私人關係去動員號召農民，後者則是依賴土地革命的口號，事實上這是一個誤解。就筆者所知，在大多數的蘇區，中共最初都是依賴地方黨員的私人關係去號召動員群眾。這些被動員的群眾大多只著眼於地方性的切身問題，並不懂得什麼土地革命，甚至

³ Jerome Chen, *The Highlanders of Central China: A History, 1895-1937* (Armonk, N. Y.: M. E. Sharpe, 1992).

搞不清楚共產黨是什麼組織。⁴這種帶有強烈自發性色彩的群眾運動與共產革命在目的與手段上扞格不入，中共是否能夠在這些自發性群眾運動的基礎上建立蘇區，端視其能否成功改造這些自發性群眾團體。⁵中共湘鄂西蘇區早期的發展便深受此一問題所苦。

由於早期湘鄂西蘇區的發展是以周逸群為中心，所以這裡我們將從周逸群的經歷開始談起。

周逸群，貴州銅鄉人。1924年加入共產黨，同年入黃埔軍校。1926年北伐戰事爆發後，周在北伐軍總政治部任宣傳隊長，是周恩來的得力助手。同年，盤據湘黔邊界一帶的軍閥賀龍部投靠北伐軍，被編為獨立第十五師，周被派任該師政治部主任。1927年6月，賀龍部被改編為第二十軍。嗣時寧漢業已分裂，共黨與武漢政府的關係也岌岌可危。隔月，賀龍部沿長江東下「討蔣」途中，汪精衛宣布清黨，賀龍部因此開往南昌，參加共黨發動的「南昌起義」。當時共黨對周逸群的評價很高，說周「是個很正經、很不錯的人，他在賀龍師裡很有影響力，也影響了賀龍本人」；至於賀龍，雖然有人認為「他同共產黨的合作是十分真誠的」，但也有人警告說這些舊將領出身者，「他們可能把整個共產黨連同共產國際裝進自己的口袋裡，他們會出賣我們」。⁶

1927年10月，「南昌起義軍」在廣東潮、汕一帶被擊潰瓦解，周逸群

⁴ 相關論述見陳耀煌：《共產黨·地方菁英·農民：鄂豫皖蘇區的共產革命（1922-1932）》（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2年）；陳耀煌：〈菁英與群眾：北伐前後閩西地區的國共合作與農民暴動〉，《新史學》，第14卷第1期（臺北，2003年），頁97-142。

⁵ 關於自發性（spontaneous）農民運動與現代共產革命運動間的差異，見Lucien Bianco, *Peasants without the Party: Grass-Root Movemen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Armonk, N.Y.: M.E. Sharpe, 2001).

⁶ 〈工農紅軍參謀部第四局關於南昌起義會議速記記錄〉（1927年9月14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會議討論中國問題速記記錄〉（1927年10月1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第7輯（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下文引用之《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簡稱為《國際文件》），頁42、49、106。

與賀龍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嗣時中共湖南省委正籌劃利用賀龍的關係，號召賀的舊部在湘西北地區進行割據。⁷中央通過此一計畫，當即決議派周逸群、賀龍等人偕同湖北省委領導郭亮，一同赴湘西北地區組織湘西北特委。⁸1928年1月，周、賀等人抵達武漢。當時湘西一帶大軍雲集，周、賀等人無法通過赴湘西北，湖北省委當即決定周、賀等人赴石首藕池口會合賀的舊部賀錦齋。同月下旬，周、賀與賀錦齋部於監利縣境內會合。⁹

監利是日後洪湖根據地的中心。二〇世紀的監利農村以窮困著稱，在2000年上言提出「三農問題」（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者便是時任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的李昌平。導致三農問題的一個原因就是政府錯誤的政策與官僚的貪污腐化及壓迫，此一情形事實上在二〇世紀二〇年代鄂中、鄂西農村中便已相當普遍。自稱曾當過土劣團總，日後並在湘鄂西地區擔任行政督察專員的雷嘯岑便認為，要成爲一個「土豪劣紳」，「是以能夠出入公門、接近官府爲先決條件」，如此纔可以「威脅人民，橫行鄉曲」。¹⁰這就印證了陳志讓《華中高地的居民》一書的中心論點，即農民的災難主要是肇因於軍閥政府的壓迫，而不是作爲階級敵人的地主，儘管那些被視爲土豪劣紳的人經常也是地方上富裕家庭出身者。

早在1927年以前，便有共產黨員在監利、沔陽等鄂中南縣份活動。在武漢國民政府時期，中共黨員曾在湖北各地廣泛建立農民協會等群眾組織。但這些群眾組織實際上並不是建立在群眾的信仰與覺悟之基礎上，大

7 〈何資深關於中共湖南省委工作向中央的報告〉（1927年12月28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各地武裝起義—湖南地區》（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頁241。

8 〈中共中央關於成立湘西北特委致郭亮信〉（1928年1月9日），《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各地武裝起義—湖南地區》，頁254。

9 〈郭亮致中央信〉（1928年1月26日），中央檔案館、湖北省檔案館編：《湖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5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下文引用之《湖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簡稱爲《湖北文件》），頁106。

10 雷嘯岑：《憂患餘生之自述》（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2年），頁86。

部分皆是依靠政治軍事力量由上而下所建立，並且許多組織的領導人就是農運所號召打倒的對象土豪劣紳，像是沔陽等縣的農協就由「秀才老爺」盤據。¹¹1927年7月武漢分共以後，中共湖北省委依據中共中央「八七會議」後兩湖暴動的指示，¹²號召全省發動秋收暴動。其中，漢川、天門、沔陽、監利、潛江等縣劃為鄂中區，派唐方九前往工作。不料，唐到後並未著力於發動農民運動，而僅是從事與土匪、紅槍會，以及軍隊等既存的武裝團體聯絡。湖北省委對此相當生氣，乃派王平章（湖北漢川人）與蕭仁鵠（湖北黃岡人）兩人前去負責工作，其中蕭仁鵠負責鄂中南部沔陽、監利、潛江三縣工作。當時中共在監、沔兩縣的農運領袖有熊傳藻（湖北沔陽人）、鄧赤中（湖北沔陽人）等人。這些在地出身的黨員，有的就是秀才老爺，加上身家之累，他們對於共黨武裝暴動的指示，難免表現猶豫與膽怯。蕭仁鵠最初也把注意力集中在發動監利縣城警備隊兵變暴動，但與共產黨有關係的警備隊隊長同樣感到猶豫，共黨乃打算對外公布該隊長與共黨有關，並捏造種種陷其入罪，以逼迫該隊長與共黨一致行動。此一計畫雖然沒有下文，但監、沔地方黨員好不容易發動了一些恐怖行動，殺了一些土劣，但這並不是在共黨指揮下有組織的行動。¹³後來，根據中共官方黨史的說法，共黨在監、沔兩縣農民隊伍的基礎上成立了湖北沔陽工農革命軍第五軍，由蕭仁鵠任軍長，沔陽黨員婁敏修（湖北沔陽人）任黨代表。¹⁴

在監利，周逸群、賀龍還會合了來自石首與華容的農民暴動隊伍，以及李兆龍（湖北石首人）領導的石首中心縣委。該縣委成立於1927年11

¹¹ 〈中共湖北省委農民部關於湖北秋收暴動經過的報告〉（1927年11月），《湖北文件》，第3輯，頁376。

¹² 〈兩湖暴動計劃決議案〉（1927年9月12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3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年），頁309-311。

¹³ 〈中共湖北省委關於湖北農民暴動經過之報告〉（1927年10月），《湖北文件》，第3輯，頁216-240。

¹⁴ 劉正崗主編：《沔陽人民革命史》（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59。

月，其委員包括段德昌（湖南南縣人）、屈陽春（湖北石首人）等重要人物。其中段德昌後來成爲湘鄂西蘇區的重要軍事領導人之一，屈陽春與另一位馮世華則是石首地區重要的農運領袖，農民對其極具信仰，在地方上有「陽、馮兩皇帝之稱」。事實上，類似屈陽春之類的人物，在中共早期農民運動中相當常見。蓋早期中共多是依賴一些在農民中具有信仰及地位的菁英分子去間接動員農民，故農民多是由於對該菁英領袖的信仰而響應動員，並不見得清楚共產黨的號召。如石首西區某農民協會的農民便說：「北區的共產黨很厲害，要不到我們這裡來才好。」孰不知領導他們的人就是共產黨。¹⁵周逸群後來也不無感慨地說，鄂西地區的黨「是利用幾個在農村中有地位的同志—所謂『先生』們去勇敢的號召群眾」。¹⁶

在會合了監、沔、石各方面的隊伍後，周逸群領導的湘西北特委會指揮這些隊伍在荊河兩岸進行了一些活動，並於1928年2月18日攻打監利縣城，但失敗，隊伍退往石首。2月下旬，湘西北特委與地方農民隊伍在石首焦山河開會，會上「關於上山（去湘鄂邊），下湖（在鄂西）的行動方針，有過爭論」，¹⁷蓋這些由地方黨員所領導的農民隊伍，都是極具地方色彩的自發性群眾團體，它們的主要目的是保護地方人民安全，捍衛地方利益，故鄧赤中等人不願率領部隊離開家鄉，跟隨周逸群等人上山去。後來周逸群便抱怨說：「鄂中特委與沔陽縣委負責人均無群眾信仰，尤其是特委鄧赤中，錯誤極了，大地方觀念極厚。」¹⁸事實上，類似情形在其它蘇區中也很常見，而且這類由於地方主義所引爆的衝突常常成爲肅反的導火線。不過，或許是由於當時周逸群等人的任務是赴湘鄂邊地區建立根據地，所以也顧不得鄂中地區那麼多。在「焦山河會議」後，周逸群就偕同

¹⁵ 〈鄂西巡視員萬濤給中央的報告〉（1929年9月4日），中央檔案館等編：《湘鄂西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4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下文引用之《湘鄂西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簡稱爲《湘鄂西文件》），頁176-177。

¹⁶ 〈周逸群關於鄂西農村工作報告〉（1929年8月），《湘鄂西文件》，第4輯，頁151。

¹⁷ 賀龍：〈回憶紅二方面軍〉，《近代史研究》，總第7期（北京，1981年），頁5。

¹⁸ 〈周逸群給中央的報告〉（1928年6月23日），《湘鄂西文件》，第4輯，頁14。

賀龍赴湘鄂邊了。

1928年3月上旬，周逸群等人終於抵達了賀龍的家鄉—桑植縣洪家關。如同陳志讓所言，在回到洪家關後，賀龍立即利用其個人的威望與私人關係，號召動員其親朋好友與舊部，成立了一支部隊。不過，賀龍的回鄉也立即引來了國軍第四十三軍李燊部的圍剿。在接下來的洪家關等戰役中，賀龍部失利，周逸群因此與賀龍部失去聯繫，回到了鄂西地區。該年7月，中共湘西特委代表陳協平帶來了湖南省委的指示，將湘西北特委併入湘西特委，並將部隊改名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隨後，紅四軍即在湘西特委的要求下，赴石門縣活動，謀奪取該縣政權，但仍遭到慘敗。紅四軍因此再度避退湘鄂邊地區活動。紅四軍接連挫敗的一個原因，即該部隊組織相當鬆散，全靠賀龍個人的影響力凝聚，地方群眾甚至視賀為「真命天子」。¹⁹但賀龍事實上也只能駕馭幾個頭目而已，而且這些頭目也沒有犧牲的決心。²⁰如此一來，即使賀龍忠誠於共產黨，也難以在其部隊中貫徹黨的指示。如賀錦齋對於黨的政策與指示便相當動搖，對於士兵的訓練及宣傳工作也堅不贊同，這就使紅四軍的改造相當困難。²¹

紅四軍後來吸收的新成員也頗為混雜，這就更增加了改造的困難度。在紅四軍避退湖北施鶴七屬時，曾一度與該地某種名為「神兵」的自發性群眾團體攜手合作，並予以吸收。緣施鶴七屬一帶長期受軍閥戰爭與苛捐雜稅所苦，地方群眾因此結合起來，成立了神兵之類帶有濃厚神權色彩的武裝團體。神兵頗類似紅槍會，其目的皆是反對苛捐雜稅與軍閥政府壓迫，是一種超階級性的組織，領導者經常是地方上富裕家庭出身者，是共黨眼裡的豪紳階級。在施鶴七屬一帶，共黨原來便無甚群眾基礎，蓋早期共黨活動集中於武漢等大城市，所吸收的黨員亦多是在城市求學的知識分

¹⁹ 〈中共鄂西特委給中央的報告〉（1929年12月31日），《湘鄂西文件》，第4輯，頁285。

²⁰ 〈陳茨庵給中央的報告〉（1928年5月10日），《湘鄂西文件》，第4輯，頁8。

²¹ 〈賀龍關於紅軍成立和湘西前委工作向中共中央的報告〉（1928年9月），《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各地武裝起義—湖南地區》，頁443。

子。而施鶴七屬一帶非中地主以上的家庭不能遣子弟到外面留學。這些地主子弟在城市求學期間，受到革命空氣的薰陶，因此加入革命。但回鄉後「很少不被優裕生活所軟化，因此明瞭與堅決的分子很少」。²²這些人當中，部分人正是神兵領袖，如施鶴部委書記楊維藩，委員陳宗瑜等人皆是。透過這些富裕家庭出身的地方黨員所間接動員的神兵群眾，其對於共產黨及其土地革命路線有多少認識，讓人不無懷疑。

讓我們再把焦點轉回到周逸群身上。周在與賀龍失散後，於1928年5月回到了洪湖地區。嗣時潛江、沔陽、監利、江陵各縣團防有聯合包剿沔西的計畫，周逸群以為，如要打破敵人的包圍，只有向外游擊。可是當時地方黨員仍深受地方觀念所影響，如沔陽黨員不願離開家鄉，石首、公安的黨員則要求回家去革命。最後，周逸群就留下沔陽游擊隊獨自保衛桑梓，率領來自石首、公安、華容的游擊隊赴石首活動。後來此一部隊編成特務大隊，由鄒資生任大隊長，專搞些個人恐怖的工作。²³鄒資生是湖南澧縣人，澧縣與湖北公安、石首接鄰，三地的革命活動有密切關係。1927年秋收暴動時期，公安、石首、江陵等縣屬駐宜昌之鄂西特委（書記湖北大冶人曹壯父）所轄，當時湖北省委曾策動公安武裝進攻江陵重鎮彌陀市。不過，中共在公安同樣沒有穩固的群眾基礎，僅能依賴某些在地方上有威望的菁英分子去間接的動員群眾，這些菁英分子並不必然對共產黨具有信仰與認識。如當時公安的一位農運領袖楊榮祥（湖南湘陰人，幼時隨家遷居公安）是五旬正紳，勇於剿匪，熱心農運，暴動時才入黨不久，雖願意隨共產黨幹，但不認識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其他還有許多地方黨員，以「家室之累」，行動消極。攻彌陀市一役，在共產黨看來，有把這些猶豫不決之地方黨員逼上梁山的意味。當時參與此役者有地方農運領袖楊榮祥、樊學賜（湖北公安人）領導的隊伍，以及由鄒資生領導，來自湖南

²² 〈中共鄂西特委及曹壯父的報告〉（1928年8月17日），《湘鄂西文件》，第4輯，頁45。

²³ 〈鄂西游擊戰爭的經過及其現狀〉（1930年5月），《湘鄂西文件》，第4輯，頁318-319。

澧縣的游擊隊。彌陀市之戰，暴動隊伍擊敗了該地團防，並搶掠該市大量財物。不過，在共產黨看來，該役「所得的只逼上梁山辦法之一半的成功」。蓋地方黨員在此役以後仍舊對黨的策略動搖猶豫。後來省委再度策劃該地暴動，地方黨員樊學賜等人堅決反對，鄂西特委因此曾計劃解決樊學賜，但暴動最後仍是無疾而終。²⁴當時隊伍有槍四、五百枝，農民亦有數千人，但由於清鄉軍的壓迫，僅拖出五十餘枝槍到石首。嗣時周逸群剛好從湘鄂邊返回，就帶著這支隊伍赴監利，與鄧赤中的隊伍會合，一起攻下了峰口鎮。在後來與沔陽的隊伍分手後，該隊伍隨周逸群轉回石首，改編為特務隊，分成三部分分赴石首、華容、監利活動。²⁵

周逸群在1928年5月率領鄒資生部自沔西轉回石首後不久，駐沙市之鄂西特委遭破壞，書記張計儲等人被害，周逸群聞訊後立刻趕赴沙市，成立臨時特委，並將特委移往宜昌。7月中旬，湖北省委派代表萬濤（四川人）前往宜昌，正式成立鄂西特委，以周逸群為書記，萬濤為副書記，曹壯父、鄒資生、段德昌等人為委員。鄂西特委設於沙市與宜昌等城市，與中共強調無產階級的領導不無關係，但當時鄂西特委主要的工作重心仍在周圍的農村地區。如江陵縣的龍灣（現屬潛江縣）當時便有相當大的發展。龍灣黨的歷史並不長，原不過只有掛名黨員十人而已。周逸群恢復鄂西特委前後，龍灣黨忽如春筍怒發，黨員一下子發展到五十幾個人，且動輒集合數百十人開會演講，大呼共產黨萬歲，要殺「辦公事」的人與土豪劣紳。後遭國軍圍剿，區委書記劉赤生（湖北江陵人）被害，農民四散，共黨活動暫時消沉，²⁶但龍灣後來仍成為湘鄂西蘇區的一個中心根據地。

不過，當時鄂西特委所發動的農民運動與團體，仍更多的表現出傳統

²⁴ 〈中共湖北省委關於湖北農民暴動經過之報告〉（1927年10月），《湖北文件》，第3輯，頁166-184。

²⁵ 〈中共鄂西特委逸群的報告〉（1928年9月19日），《湘鄂西文件》，第4輯，頁58。

²⁶ 〈中共鄂西特委給湖北省委的報告〉（1928年8月17日），《湘鄂西文件》，第4輯，頁32-33。

自發性農民運動的色彩，並不是黨所領導的現代革命運動。例如，松滋、枝江、宜都三縣在此一時期爆發了大規模的饑民吃大戶鬥爭，此乃傳統自發性的農民經濟抗爭。對於這類鬥爭，共產黨員應當打入其中，在鬥爭過程中逐漸提高農民的政治覺悟，以及對中共的認識。不料，當時松、枝、宜三縣黨領導不僅不能領導農民由經濟鬥爭走上政治鬥爭之途，甚至還故意避開政治鬥爭。有一次群眾因被團防壓迫，自發的起來反抗，繳了四枝槍，結果卻又把槍退還，以表示他們沒有「政治臭味」，這在鄂西特委看來，是一個非常大的錯誤。²⁷另外，在江陵的岑河口之某一鄉團原係共黨所領導，後有「符門」勢力打入該鄉團，地方黨員竟相競加入該鄉團，一方面是為獲得工資，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信仰符門，以致於黨員對黨的信仰逐漸消沉，對黨的政策聽而不聞。²⁸

陳志讓認為湘鄂西蘇區的建立發展是維繫在賀龍的個人魅力與其私人關係上，孰不知利用這種方法所發動的農民運動，具有嚴重的侷限性。如上述，洪湖地區早期的領導者如鄧赤中、屈陽春等人，同樣也是利用其個人的影響力與關係去發動農民，但他們所組織的隊伍，若不是拒絕黨的調動，便是根本否定黨的暴動路線，不受黨所控制。這種自發性的農民運動，既難以發展，也不容易維持，如松、枝、宜的吃大戶運動與江陵岑河口的鄉團運動所示般。如何把這些傳統的自發性群眾運動轉變成為黨所控制的革命運動，這將是湘鄂西共黨所不得不面對的課題。

叁、赤白對立的形成

由於地方黨員與群眾對於黨的信仰與認識薄弱，這就難保在政府當局

²⁷ 〈周逸群關於鄂西農村工作報告〉（1929年8月），《湘鄂西文件》，第4輯，頁152。

²⁸ 〈中共鄂西特委給湖北省委的報告〉（1928年8月17日），《湘鄂西文件》，第4輯，頁33-34。

的威脅利誘下，這些地方黨員與群眾不會反水（背叛）。以沔陽縣為例，在1928年10月以前，沔陽的剿共主要由地方豪紳負責，地方豪紳在剿共時手段殘忍，雖然也有一定成效，但卻經常起到為淵驅魚的效果，把群眾趕到共產黨一方。10月以後，湖北省政府當局派軍隊前來圍剿，軍隊採取軟硬兼施之法，一方面清鄉，另一方面則槍斃了過去因殘酷剿共而被民眾怨恨的地方團防領袖李伯岩，還號召共產黨員及群眾自首。²⁹結果果然引來了大批共黨分子自首，據鄂西特委所云，全縣黨員除二人外全部自首。³⁰對於這些動搖的自首分子，根據共黨的紀律，當然必須予以開除。可是當時共黨在沔陽勢力薄弱，捨利用這批自首黨員外別無他法恢復工作。因此，後來周逸群又允許了這些自首分子回黨。³¹此一事件成為日後周被控為反革命分子的理由之一。

不過，政府當局與地方豪紳在剿共之時，大部分仍是採取殘酷的殺戮手段，這就使得那些原本並不相當信仰共產黨的地方黨員與群眾，愈益投向共產黨的懷抱。周逸群後來便指出，鄂西黨儘管不能提出符合地方群眾需求的口號，仍能夠擁有大批群眾，一個原因就是政府當局和地方土劣的蠢笨，完全不和共產黨爭群眾，只一味用清鄉的辦法。如沔陽黨員大批自首之風並未能影響到鄰近的監利縣之組織，原因之一就是監利土劣只知剝削民眾，燒殺民眾，而不知運用改良主義，³²如此當然加強了赤區群眾與共黨的團結。再者，那些被誘反水的農民，在反水後被迫繳很重的槍款與捐款，因此反而想念共產黨。³³不過，共黨往往也採取殘酷的手段報復圍剿，燒殺白區群眾。在湘鄂西蘇區早期發展的過程中，這種無目的燒殺，

²⁹ 〈中共鄂西特委給中央的報告〉（1928年11月18日），《湘鄂西文件》，第4輯，頁73；顏穎：〈李伯岩喪命記〉，《洪湖文史》，第4輯（洪湖，1988年），頁83-89。

³⁰ 〈鄂西組織狀況統計表〉（1929年5月15日），《湘鄂西文件》，第4輯，頁126。

³¹ 〈萬濤給中央的報告〉（1929年8月11日），《湘鄂西文件》，第4輯，頁146。

³² 〈周逸群關於鄂西農村工作報告〉（1929年8月），《湘鄂西文件》，第4輯，頁153-154。

³³ 〈萬濤給中央的報告〉（1929年8月11日），《湘鄂西文件》，第4輯，頁145。

被視為理所當然，假使有人不主張燒殺，便會被罵是機會主義。³⁴如此一來，就形成了所謂的「赤白對立」。而由於白區豪紳多居住於城市，共黨的赤區則以鄉村為主，所以赤白對立也經常以城鄉對立的方式表現出來，如共黨黨員及群眾裡許多人便抱持著毀滅城市的報復觀念。³⁵

再者，在中共各蘇區早期發展的過程中，我們經常可以發現某些桀驁不馴的地方菁英黨員，他們常常為了維護自身與地方的利益，公然抗拒上層的指示，並且拒絕上層調動與改編其所領導的隊伍，這種情形在湘鄂西蘇區早期的發展過程中也普遍存在，像上述沔陽鄧赤中拒絕周逸群調動沔陽隊伍就是一個例子。不過，在湘鄂西蘇區，這些桀驁不馴的地方菁英，在早期發展過程中，許多在政府當局的圍剿中犧牲。如公安楊榮祥、樊學賜與沔陽鄧赤中在1928年間先後遇害，³⁶監利傅家灣農民領袖熊傳藻也在1929年初被害。³⁷這些地方菁英黨員的遇害當然給革命運動帶來一定的傷害，但它一方面既可促進黨組織的更新，提拔工農分子取代這些富裕家庭出身的菁英分子，使更符合共黨階級化的需求（但這些被驟然提拔的工農分子，都會自驕，會發生不良的影響，如江陵黨便有反知識分子的傾向）；³⁸再者，參照其他蘇區的經驗看來，至少湘鄂西蘇區的共黨領導在日後整編地方軍隊以及加強對地方控制之時，較少遇到來自這些桀驁不馴之地方菁英的阻撓，同時所發生本土與外來幹部的衝突也不如其他蘇區嚴重。

³⁴ 〈鄂西游擊戰爭的經過及其現狀〉（1930年5月），《湘鄂西文件》，第4輯，頁319。

³⁵ 〈鄂西巡視員萬濤給中央的報告〉（1929年9月4日），《湘鄂西文件》，第4輯，頁165。

³⁶ 公安縣志編纂委員會：《公安縣志》（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0年），頁622、635-636；〈中共鄂西特委給中央的信〉（1928年10月10日），《湘鄂西文件》，第4輯，頁67。

³⁷ 朱德源：〈土地革命年代的傅家灣人民〉，《洪湖文史》，第3輯（洪湖，1988年），頁49。

³⁸ 〈中共鄂西特委致中央信〉（1929年4月15日），《湘鄂西文件》，第4輯，頁107。

無論如何，就在政府當局與土豪劣紳的步步進逼下，湘鄂西共黨活動的範圍雖日漸縮小，其內部卻愈益鞏固。1928年9月，周逸群祕密回到上海，黨中央向其傳達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六大）的指示。同年秋，周逸群回到宜昌。當時湘鄂西地區各處都在圍剿共黨，鄂西特委與各地黨部也接連遭到破壞。周逸群致力於恢復與聯繫各地黨組織，於1929年3月6日在江陵縣沙崗召開了鄂西特委第一次擴大會議，一方面向鄂西黨員傳達六大的指示，另一方面也改組了特委組織，成立了以周逸群、萬濤為正副書記，錢定生（湖北江陵工人，江陵縣委書記）、屈陽春（石首縣委書記）、鄭熾昌（四川人，宜昌縣委書記）等人為委員的鄂西特委。³⁹同時，鄂西特委又成立了鄂西游擊大隊，下分二中隊，第一中隊由段玉林（湖北石首人）、彭之玉（湖北江陵人）領導，以彭之玉的家鄉江陵沙崗為中心開展活動，此一地區日後形成白露湖根據地；至於原在監、沔活動的隊伍則編成第二中隊，由段德昌領導，活動於洪湖周圍一帶。當時鄂西特委主要的工作就是發動農村游擊戰爭，原來特委計畫江（陵）監（利）石（首）、施鶴七屬（賀龍部所在地）與興（山）巴（東）（秭）歸三處同時發動，但實際上特委與後二者黨部皆失去聯繫，故只能指揮江監石一帶之游擊隊。⁴⁰

當此之際，兩湖事變爆發，鄂西駐軍大部調離，共黨乃乘機大肆擴張。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游擊隊先後打了幾場勝仗，攻克沙崗、毛家口、峰口等大集鎮，甚至還曾一度攻占石首縣城。後來周逸群便不無自豪的說，在兩湖事變爆發後的五個月以來，游擊隊主要攻擊對象是地方團防，總計作戰大小數十次，從未打過敗戰。⁴¹隨著軍事的勝利，游擊隊獲得相當發展。1929年7月間，游擊大隊改編為鄂西游擊總隊，周逸群兼

³⁹ 〈中共鄂西特委給中央的報告〉（1929年3月16日），《湘鄂西文件》，第4輯，頁100。

⁴⁰ 〈鄂西工作報告〉（1929年5月16日），《湘鄂西文件》，第4輯，頁139。

⁴¹ 〈周逸群關於鄂西農村工作報告〉（1929年8月），《湘鄂西文件》，第4輯，頁155。

總隊長，段德昌任參謀長，下轄三個大隊。不過，8月以後，鄂西國軍反攻，加上赤區內部反水的破壞，江陵、石首赤區先後失陷，游擊隊被迫轉往華容、洪湖地區活動。後游擊隊反攻石首，又幻想經沔陽到潛江、江陵各縣游擊，還與敵軍大戰於沙市，損失極大，故又退守洪湖地區。⁴²從此開始了以洪湖地區為中心的割據。

但是，群眾與黨員對於黨的認識及信仰，以及黨對地方的控制，並未隨著游擊隊與赤區的發展而深入。事實上，此一時期游擊隊的擴張，許多僅具形式上的意義。如江陵龍南區有組織的群眾雖號稱有兩萬上下，但並不具強固的基礎，他們的形成是這樣：「如你能約得三、四十人，他們就封一個排長；約得百多人，他們就封一個連長。」⁴³像這種號召而來的群眾，當然也就談不上對黨具有什麼深刻的信仰與認識。

尤有甚者，游擊隊的行動仍充分反映著傳統自發性農民運動的色彩。例如，在某次攻打峰口的戰役中，中途因為時間關係而變更計畫，隊伍中的沔陽籍士兵便大罵隊長怕死，說他不是沔陽人所以忽視沔陽的工作，這是農民地方主義的充分表現。⁴⁴再如，江陵縣龍南區附近的張家場是國民黨元老張知本的家鄉，張姓在該地勢力頗大。該姓幾個豪紳禁止族人參加共產黨的農民協會，農協大憤，派人去殺該豪紳。不料，在此次行動中，竟有黨員高呼「姓張的是反動派，見姓張的都要殺」，引起了宗族仇殺，張姓族人五百餘人遂行反水，聯合普濟觀駐軍進攻赤區。這次由於宗族仇殺引起的赤白對立，就是1929年8月以後江陵赤區瓦解的主要原因。⁴⁵

⁴² 〈鄂西游擊戰爭的經過及其現狀〉（1930年5月），《湘鄂西文件》，第4輯，頁322-323。

⁴³ 〈鄂西巡視員萬濤給中央的報告〉（1929年9月4日），《湘鄂西文件》，第4輯，頁173。

⁴⁴ 〈周逸群關於鄂西農村工作報告〉（1929年8月），《湘鄂西文件》，第4輯，頁156。

⁴⁵ 〈鄂西巡視員萬濤給中央的報告〉（1929年9月4日），《湘鄂西文件》，第4輯，頁174-175。

很顯然地，推動此一時期赤區與游擊戰爭的發展，以及維繫其內部團結的主要因素，是赤白對立的仇恨報復以及農民地方主義等傳統心態，並不是什麼階級覺悟或黨的組織紀律。當時石首縣委擴大會便指出：「石首完全是小農經濟自給的社會，階級分化不明顯，經濟上沒有好多衝突，所以革命鬥爭不是明顯的階級行動，而是復仇的反應的擴大。」⁴⁶事實上，此一時期的湘鄂西蘇區確實未曾推動土地革命。此一情形與地方客觀情形當然不無關係，蓋江、石、監、沔等地都是自耕農占多數，分不出地主與佃農，土地問題當然也就無從解決。⁴⁷另一方面，中共六大後所採取的路線也緩和了階級鬥爭。⁴⁸鄂西特委在1929年5月時便指出，各地富農態度，目前多是傾向革命，因為他們也受到苛捐雜稅的壓迫，也同樣反地主豪紳，所以事實上不應故意作反富農的鬥爭。⁴⁹這顯然正是六大路線的反映。

不過，1929年6月中共六屆二中全會以後，立三路線上臺，共黨對於富農的態度愈趨激進，⁵⁰這同樣也反映在同年12月於石首袁家舖召開的中共鄂西第二次代表大會。在該大會上，鄂西特委宣稱，富農雖然也參加反捐稅、反豪紳的鬥爭，但隨時隨地表現出他們的妥協和動搖，最後便跑入

46 〈鄂西巡視員萬濤給中央的報告〉（1929年9月4日），《湘鄂西文件》，第4輯，頁176。

47 〈萬濤給中央的報告〉（1929年8月11日），《湘鄂西文件》，第4輯，頁144。

48 如對於富農的態度，中共六大後所發佈的〈農民問題決議案〉便指出：「在富農還沒有消失革命的可能性，因軍閥官僚的壓迫而繼續鬥爭的時候，共產黨應企圖吸收富農於一般農民反軍閥反地主豪紳的鬥爭之內。當富農動搖於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時期，在不妨礙貧農雇農鬥爭範圍內，黨不應該故意加緊對富農的鬥爭。」顯然有意緩和階級鬥爭。見〈農民問題決議案〉（1928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4冊，頁210。

49 〈鄂西工作報告〉（1929年5月16日），《湘鄂西文件》，第4輯，頁138。

50 在六屆二中全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即指出：「富農在中國特殊經濟條件之下兼有半封建半地主的剝削，所以他在土地革命過程中，便要由動搖以至反革命，所以必須堅決的反對富農，才能徹底完成土地革命。」見〈政治決議案〉（1929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頁216。

反革命的營壘中去了。所以現時應積極反富農。⁵¹隨著反富農路線而來的是對土地革命政策的強調，根據中共鄂西特委的說法，在鄂西第二次代表大會以後，江、監、石三縣除了白軍駐守的重要城鎮外，其餘鄉村幾乎完全為共黨所占，且該三縣均已成立蘇維埃政府，並沒收分配地主豪紳、祠堂與廟宇的土地。⁵²

然而，對於階級鬥爭的強調，不能不揭露蘇區內部所存在的重大問題，即過去蘇區內部黨、政、軍、群的結合，許多純粹是依賴某些農民的傳統習性（如復仇觀念、地方主義）、私人關係，以及某些地方菁英的影響力，而不是憑藉黨的組織紀律與所謂的階級與政治覺悟。在農民運動發動的初期，黨的組織與基礎並不深入與穩固之時，這樣的作法固然無可厚非。不過，一旦蘇區開始向外擴張，黨的影響力開始向下紮根之際，這些問題就不得不浮上檯面了。

肆、蘇區內部矛盾的浮現

1930年1月，蔣介石、馮玉祥及閻錫山在北方地區醞釀大戰，南方共產黨勢力也乘機蠢蠢欲動。中共湖北省委有鑒於局勢之發展，乃下令洪湖根據地的紅軍與賀龍之紅四軍會合，並向長江下游發展。⁵³當時洪湖地區的紅軍已於鄂西第二次代表大會後擴編為中央獨立師，以段德昌為師長，下設二支縱隊，由張一鳴（湖南慈利人）、段玉林分別擔任縱隊長。其中

⁵¹ 〈中共鄂西第二次代表大會關於鄂西黨目前的政治任務與工作方針決議案〉（1929年12月），《湘鄂西文件》，第4輯，頁204。

⁵² 〈中共鄂西特委給中央的報告〉（1930年3月31日），《湘鄂西文件》，第4輯，頁292-293。

⁵³ 〈中共湖北省委通告（第一號）〉（1930年2月24日），《湖北文件》，第7輯，頁13。

第二縱隊在鄂西二大後正在江陵地區發展，並已攻下江陵大鎮郝穴。⁵⁴因此，當湖北省委指示發下時，只有第一縱隊接到。第一縱隊乃根據省委的指示向沔陽、漢川一帶發展，與第二縱隊分途活動。直到二月初中央軍委巡視員柳直荀來了以後，二支縱隊才在監利汪家橋會師，改編為紅六軍。⁵⁵軍長原定於1929年9月由中央派任偕同許光達（湖南長沙人）一起來鄂西地區工作的孫德清（安徽壽縣人），⁵⁶後孫因病未到任，由四川人鄺繼勛接任。政委則由周逸群擔任。六軍下設二支縱隊，分別是段德昌的第一縱隊與段玉林的第三縱隊。另外還組成了以王一鳴為書記的六軍前委。

紅六軍成立後，迅速發展，先是向北攻下了監利的新溝鎮與潛江縣城，後又南下攻克郝穴、藕池與石首縣城，然後又北上攻克沔陽縣城與仙桃鎮，打到了漢水邊。短短幾個月內，監、沔、江、潛根據地便打成一片。1930年4月，鄂西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在石首調弦口召開，成立了鄂西聯縣政府，由周逸群任主任。

嗣時，中共中央於1930年4月15日召集湖北省代表在上海召開了湖北全省代表大會。會上，中央傳達了奪取一省與幾省政權乃至於建立全國革命政權的任務，⁵⁷並號召貫徹反富農路線，以及土地國有政策。⁵⁸根據此一激進路線的審視，中共中央指責「湖北黨內右傾很危險、很嚴重」，⁵⁹其中鄂西黨也被批評在政治、土地與紅軍問題上都有嚴重錯誤，⁶⁰如紅六軍從不過問政權與土地問題，而且成份不純，像是第一縱隊多富人，第二

⁵⁴ 〈中共鄂西特委給中央的報告〉（1929年12月31日），《湘鄂西文件》，第4輯，頁283-284。

⁵⁵ 〈鄂西游擊戰爭的經過及其現狀〉（1930年5月），《湘鄂西文件》，第4輯，頁324。

⁵⁶ 許光達：〈紅六軍成立前後〉，中共監利縣委黨史資料征編委員會辦公室主編：《湘鄂西風暴—監利革命歷史回憶》（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1986年），頁16。

⁵⁷ 〈政治任務決議案（草案）〉（1930年4月），《湖北文件》，第7輯，頁127。

⁵⁸ 〈政治報告〉（1930年4月15日），《湖北文件》，第7輯，頁119-120。

⁵⁹ 〈中央代表致詞〉（1930年4月15日），《湖北文件》，第7輯，頁98。

⁶⁰ 〈中共湖北省代表報告〉（1930年4月15日），《湖北文件》，第7輯，頁155。

縱隊以貧人居多。⁶¹會議以後，中共成立了湖北省行動委員會，以糾正過去的錯誤，並積極貫徹立三路線。其中，柳直荀被任命負責鄂西地區的工作。⁶²

當此之際，紅六軍與賀龍領導之紅四軍已在公安會師，並合編成紅二軍團，紅四軍改名為紅二軍。軍團總指揮由賀龍擔任，周逸群任軍團前委書記。至於紅二軍軍長仍由賀龍兼任，鄺繼勛則繼續擔任紅六軍軍長，計兩軍合編後共有5,000枝槍左右。⁶³

紅二軍團是一支成份相當混雜的隊伍。像是賀龍帶來的紅二軍，內部吸食鴉片者頗多，其中還有一部分是由鄂西神兵改編而成。⁶⁴紅六軍方面，軍長鄺繼勛桀驁不馴，目中無人，甚至連鄂西特委也不放在眼裡，說：「鄂西特委沒有一人能說服我的。」⁶⁵該軍大部分是由地方農民生長出來，缺乏軍隊、政治訓練，並有濃厚的地方觀念，其中也有部分是由神兵改編而來。這種隊伍雖然極有戰鬥力量，但他們對黨與共產革命的認識及信仰卻不能不讓人懷疑。⁶⁶

事實上，類似的情形也普遍存在於地方黨組織內部。以沔陽黨為例。如前所述，沔陽黨在1928年國民黨的剿共當中，大批自首。隨後，中共由於在沔陽缺乏基礎，不得不重新起用這些自首黨員。但這些自首黨員的表

⁶¹ 〈劉××關於軍事運動和兵士運動問題的報告〉（1930年4月），《湖北文件》，第7輯，頁176。

⁶² 〈中共湖北省委給中央的報告〉（1930年4月24日），《湖北文件》，第7輯，頁330-331。

⁶³ 〈中共鄂西特委給中央的信〉（1930年8月10日），《湘鄂西文件》，第4輯，頁361。

⁶⁴ 〈紅二軍軍委關於紅二、六軍會師前部隊作戰情況給中央的報告〉（1930年7月22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第1輯（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頁505。

⁶⁵ 〈中共鄂西特委給中央的報告〉（1930年6月10日），《湘鄂西文件》，第4輯，頁343-344。

⁶⁶ 〈鄂西游擊戰爭的經過及其現狀〉（1930年5月），《湘鄂西文件》，第4輯，頁328-329、334。

現極壞，他們回黨後只做兩個工作，第一就是綁票，任一個黨支部都可以自由綁票；第二則是戀愛，他們組織所謂的「戀愛團」，專門研究戀愛，還有所謂的「玩火委員會」，意思就是到哪裡就在那裡亂交，農民都要供他們女人，不然就得嚐盒子炮。⁶⁷事實上，類似的行徑在蘇區內部相當普遍。如蘇維埃政府反富農的一個辦法就是綁票；還有「扯皮絆」的風氣在蘇區內亦頗盛，所謂的「扯皮絆」就是暫時的夫妻，用上海話來說就是「打炮」。⁶⁸當然，這類行爲並不算是什麼反革命，至於自首也可能是在客觀環境的脅迫下所不得不爲之者，所有這些行爲不過一再說明了共產黨在湘鄂西蘇區的組織基礎並不穩固，人民仍舊爲傳統的意識與生活習慣所支配，對於黨與革命缺乏認識及信仰。

但是，伴隨著立三路線的貫徹，中央路線的愈趨激進，這些貪污腐化與自首的行徑，就更加難以令人容忍，而且逐漸的被視爲所謂反黨、反革命的罪證。在4月所召開的湖北代表大會上，中共中央便號召反對組織上的「右傾」，反對封建思想、私人情感，還要堅決反對並肅清黨內的自首分子。⁶⁹事實上，鄂西特委早就很不滿沔陽黨了，罵沔陽黨有錢腐化，只知鬧意氣找戀愛。⁷⁰在接到中央的指示後，鄂西特委與新沔陽縣委對於自首分子的態度更嚴厲，無限上綱上線，批評自首黨員與富農結合，有反黨、反蘇維埃的行動。⁷¹過去主張恢復自首黨員黨籍的鄂西特委書記周逸群現在也批評沔陽自首分子，說他們圍繞著縣委領導樵人形成一個小團

67 〈中共湖北省委給中央的報告〉（1930年2月25日），《湖北文件》，第7輯，頁47。

68 〈鄧中夏給長江局轉中央信〉（1930年10月15日），《湘鄂西文件》，第2輯，頁29-30。

69 〈組織問題討論結論〉（1930年4月17日），《湖北文件》，第7輯，頁169。

70 〈楊桔關於沔陽工作給湖北省委的報告〉（1929年12月17日），《湘鄂西文件》，第4輯，頁388-393。

71 〈中共沔陽縣委給湖北省委的報告〉（1930年6月6日），《湘鄂西文件》，第4輯，頁395。

體。⁷²後來，赴沔陽巡視的特委巡視員周小康（湖南安鄉人）以反革命改組派的罪名槍斃樵人，並開除了所有自首分子的黨籍，搞得沔陽黨大為不滿，覺得黨騙了他們，說既然要開除他們，過去為什麼又要恢復其黨籍呢？⁷³無論如何，沔陽事件並未因此告一段落，在後來湘鄂西蘇區內部的衝突與肅反中，這一事件將再度被提起。

這種由於黨與軍隊內部成份混雜與分裂，以及隨之而來的黨與軍隊的對峙、衝突，正是湘鄂西蘇區後來所以爆發大規模肅反的主要原因。在1930年4月湖北省代表大會後，湖北省委規定當時紅二軍團的任務是占領沙市，完成鄂西地區的暴動，⁷⁴鄂西特委也接受了此一任務。⁷⁵然而，沒想到紅二軍團竟不理會特委的指示，搞起所謂聲東擊西的辦法去打監利，結果失敗，全軍團為失敗情緒籠罩。為了提振士氣，紅二軍團復游擊天門、潛江一帶，攻下潛江縣城與岳口。特委氣得急跳腳，屢次去信要紅二軍團進攻沙市均不見回信。事實上，當時二軍團內部有很多問題，連賀龍也沒辦法處理。⁷⁶當此之際，沔、監赤區發生大反水，許多農民加入了「北極會」之類的「反動」組織。北極會是一種類似紅槍會的地方自衛性團體，也以吃靈符刀槍不入的信仰號召農民。當時沔陽一帶北極會勢力頗大，他們配合國軍進剿蘇區，迫使紅二軍團不得不退回洪湖一帶。當時赤區共黨群眾對北極會採取了殘酷燒殺的報復手段，造成嚴重的赤白對立。⁷⁷整個

⁷² 〈關於鄂西工作總任務（附結論）〉（1930年6日），《湘鄂西文件》，第4輯，頁354。

⁷³ 〈中共沔陽縣委報告〉（1930年11月），《湘鄂西文件》，第4輯，頁412-413。

⁷⁴ 〈中共湖北省委給鄂西特委信〉（1930年6月27日），《湖北文件》，第7輯，頁485。

⁷⁵ 〈關於鄂西工作總任務（附結論）〉（1930年6月），《湘鄂西文件》，第4輯，頁351。

⁷⁶ 〈中共鄂西特委給中央的信〉（1930年8月10日），《湘鄂西文件》，第4輯，頁362。

⁷⁷ 〈鄧中夏同志關於紅二六軍的報告〉（1930年10月19日），《湘鄂西文件》，第2輯，頁34；許光達：〈紅六軍歷史材料〉（1945年7月），《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第2輯，頁675。

沔陽荊河以北一帶幾乎成爲北極會盤據的白區。

後來，鄂西特委由周小康主持，在江陵沙崗召開了鄂西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指責紅二軍團右傾，堅決要紅二軍團攻打沙市。⁷⁸紅二軍團總算在特委的三催四請下，不情不願的於1930年9月上旬去打沙市了。但沒想到沙市一役，紅二軍團慘遭敗戰。紅二軍與紅六軍之間早就因屢受挫折而彼此埋怨，沙市一役後更大有分家傾向。⁷⁹

在此之際，中共中央突發奇想，要鄂西紅軍進攻武漢。⁸⁰當時負責執行此一路線者是甫自蘇聯回國的鄧中夏。鄧與六屆三中全會後的中央領導瞿秋白相善，在蘇聯時，張國燾就指責瞿秋白和他二人在富農問題上有右傾機會主義。⁸¹不過，當時共產國際爲了搞倒李立三的領導，仍派瞿、鄧等人回國。瞿在回國後就在9月召開了六屆三中全會，取代了李立三在黨內的領導地位。鄧中夏則被派赴鄂西領導紅二軍團。

鄧中夏於1930年9月與紅二軍團會合後，修改當時紅二軍團的任務爲渡江截斷武長鐵路，占領岳州，以配合江西的紅一方面軍進攻長沙。紅二軍團旋即在鄧中夏的率領下攻占了監利縣城，並在縣城召開會議，將鄂西特委與鄂西聯縣政府擴編爲湘鄂西特委與湘鄂西聯縣政府，由鄧中夏分別擔任特委書記與政府主席，但以鄧必須隨軍行動，故又任命周逸群代理特委書記並負責地方工作。⁸²在攻下監利後，爲了解決經濟問題，鄧中夏等領導又決定去攻占新堤市。但以新堤易守難攻，後又決定北上攻打仙桃。

⁷⁸ 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頁61。

⁷⁹ 〈鄧中夏給長江局並轉中央的報告〉（1930年10月6日），《湘鄂西文件》，第2輯，頁21。

⁸⁰ 〈中央給長江局的信〉（1930年8月1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第1輯，頁534。

⁸¹ 〈張國燾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和國際監察委員會的信〉（1930年4月17日），《國際文件》，第9輯，頁121-125。

⁸² 〈鄧中夏給長江局並轉中央的報告〉（1930年10月6日），《湘鄂西文件》，第2輯，頁21-25。

⁸³10月初，紅二軍團順利攻占仙桃，但在仙桃休息一天後，前委又發現此地區並非富庶之地，且荊江以北是紅槍會、北極會等反動團體的地盤，故前委乃決定把紅二軍團拖回荊江南岸的峰口鎮。⁸⁴

當時紅二軍團幾乎是毫無目標的東奔西闖。在峰口休息後不久，鄧中夏又率紅二軍團南下攻占湖南的南縣、華容，隨後又西向進攻津市與澧縣。當時中共中央頗為奇怪，不清楚鄧中夏葫蘆裡賣什麼藥，以為紅二軍團是要去攻占湘西要隘常德，乃致信鄧中夏，提醒他不要忘了截斷武長路的計畫。⁸⁵事實上，當時湘鄂西特委也毫無頭緒，因為他們已和紅二軍團斷了聯繫。⁸⁶據賀龍的回憶，當時紅二軍團內部對鄧中夏也不滿，要他把部隊開回洪湖蘇區，但鄧卻說他要建立第二個中央蘇區，⁸⁷隨後就把部隊又向西開往湖北松滋、鶴峰一帶。

湘鄂西特委在知道鄧中夏的用意後，相當恐慌。原來國軍在1930年底解決北方的中原大戰後，已調集大軍開始對南方中共蘇區進行圍剿，其中對湘鄂西蘇區的圍剿開始於11月。而在紅二軍團離開後，蘇區已沒有正規軍隊留守，只有一些在紅二軍團西進途中掉隊的部隊回到洪湖蘇區，另外還有因為反對鄧中夏西進而被鄧趕回洪湖蘇區的原六軍軍長段德昌及部分隊伍。⁸⁸為了應付國軍的圍剿，湘鄂西特委只好把這些殘軍臨時湊集成新六軍，以段德昌為軍長，並不斷致信鄧中夏，要他把紅二軍團拖回洪湖根

⁸³ 〈鄧中夏同志關於紅二六軍的報告〉（1930年10月19日），《湘鄂西文件》，第2輯，頁33-34。

⁸⁴ 〈中共湘鄂西特委關於政治經濟及各種工作情況給中央的報告（第五號）〉（1930年11月22日），《湘鄂西文件》，第2輯，頁52。

⁸⁵ 〈中共中央給長江局轉中夏同志並湘鄂西特委的指示〉（1930年11月21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第1輯，頁574。

⁸⁶ 〈中共湘鄂西特委關於政治經濟及各種工作情況給中央的報告（第5號）〉（1930年11月22日），《湘鄂西文件》，第2輯，頁52。

⁸⁷ 〈賀龍關於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間湘鄂西紅軍及革命根據地的若干問題的談話〉，《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第2輯，頁650。

⁸⁸ 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頁72。

據地。但鄧竟回信要特委全體撤到湘鄂邊去與他會合。特委氣得大罵，說鶴峰一帶根本沒有群眾基礎，只是表面上的蘇維埃政權，紅二軍團撤到那裡能幹什麼呢？⁸⁹無論如何，鄧中夏是不打算回洪湖了。而洪湖蘇區的紅軍也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節節敗退，洪湖險要，盡被國軍突破，群眾也被迫反水，監、沔蘇維埃政權塌台大半。湘鄂西特委與新六軍只好退到華容、石首一帶防禦。⁹⁰

事實上，此時中共中央也已有調換鄧中夏的意圖。原來鄧在到了湘鄂西蘇區之初，大肆批評立三路線的反富農政策，說由於反富農政策過激，甚至把中農當成富農看待，因此引起群眾不滿與反水。⁹¹最初中央與國際還相當贊同鄧的意見，說鄧的來信正證明了立三路線的錯誤。⁹²然而，不久後事態就朝向不利於鄧中夏的方向發展。一方面，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由王明所領導之國際派取代了被指為調和主義者的瞿秋白等人，在1931年1月所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擔任中共中央的領導。另一方面，王明的國際派雖然也宣稱反立三路線，但他們立場之激進卻不下李立三。再者，曾指責瞿秋白、鄧中夏在富農問題上犯了右傾錯誤的張國燾也在此時回國，站在王明國際派身邊。在國際派領導看來，鄧中夏所執行的根本就是富農路線，鄧與其黨羽除了關心地主寡婦和孩子以外，沒有其他可關心的。甚至在這方面鄧還發明了小腳女人應當比大腳女人分田少之類的「混帳理論」！⁹³

⁸⁹ 〈中共湘鄂西特委關於蘇區內軍事情況給中央的報告〉（1931年3月3日），《湘鄂西文件》，第2輯，頁68。

⁹⁰ 〈中共湘鄂西特委關於紅二軍團與蘇區失掉聯繫後的經過報告〉（1931年3月7日），《湘鄂西文件》，第2輯，頁74-76。

⁹¹ 〈鄧中夏給長江局轉中央信〉（1930年10月15日），《湘鄂西文件》，第2輯，頁28-29。

⁹² 〈米夫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30年12月2日），《國際文件》，第9輯，頁508-509。

⁹³ 〈馬季亞爾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的信〉（1931年1月17日），《國際文件》，第10輯，頁29。

無論如何，鄧中夏不可避免將被調任，那麼，又該由誰來取代他呢？當時中共中央所設想的名單有同為湖南人的夏曦與李維漢，因為夏曦與鄧中夏是死對頭，所以最初中央傾向派李維漢去湘鄂西。不過，鑒於鄧中夏將被調走（事實上沒有），而且夏曦與賀龍是好朋友，所以最後中共中央還是決定派夏曦去湘鄂西蘇區。⁹⁴就這樣，被中共官方黨史家視為湘鄂西蘇區肅反之罪魁禍首夏曦就在1931年3月風塵僕僕的抵達洪湖地區。

伍、湘鄂西蘇區的肅反

1931年3月初，夏曦抵達洪湖地區，並於月底成立湘鄂西中央分局，作為湘鄂西蘇區最高黨領導機關。夏曦當時的首要工作就是把紅二軍團拖回洪湖。他在抵達洪湖地區後立刻派唐赤英（四川重慶人）去施鶴七屬聯絡紅二軍團，傳達中央已撤銷鄧中夏本兼各職，以及要求紅二軍團東下洪湖之指示。⁹⁵當時紅二軍團甫於長陽縣枝柘坪召開前委與黨員代表大會，並改編紅二軍團為紅三軍，由賀飛任軍長，鄧中夏仍任政委。會上鄧中夏承認過去犯了脫離後方根據地的錯誤，但他又說現在雖然紅三軍的首要任務是東下解救洪湖蘇區，可是鑒於洪湖地區湖港分歧，不利大部隊活動，而且洪湖地區正在白軍重重包圍之中，如紅三軍貿然回洪湖蘇區，無異自投羅網。故當下紅三軍應占領荊（門）當（陽）遠（安）一帶為根據地，以圖發揮圍魏救趙之效。⁹⁶

當此之際，國軍於1931年4月間對洪湖根據地又發起了另一波新的圍

⁹⁴ 〈雷利斯基同向忠發和周恩來談話記錄〉（1931年2月19日），《國際文件》，第10輯，頁87。

⁹⁵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給二軍團前委的信〉（1931年3月21日），《湘鄂西文件》，第1輯，頁1-3。

⁹⁶ 〈紅三軍經營荊當遠新根據地的計劃〉（1931年4月1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第1輯，頁636。

剿。6月間，由於大雨連綿，長江、漢水發生大水，長江北岸蘇區盡成澤國，南岸地區也行動不便。當時湘鄂西中央局感嘆，這個水災比國民黨圍剿還厲害，不僅造成軍事上的困難，還導致蘇區發生嚴重糧荒，許多群眾因此向外逃荒。⁹⁷在此一局勢下，自身的維持都已相當困難，夏曦所領導的中央分局也不再堅持紅三軍一定要回洪湖蘇區，並致信當時已流竄至鄂西北房縣一帶的紅三軍，要他們堅持鞏固其所占領的區域，只須軍事上向荊門地區活動，不再非得回洪湖蘇區不可。⁹⁸隨後，由於蘇區內部的情勢愈益嚴苛，連紅軍也成爲饑軍，無法再維持，故中央分局決議由新六軍改編而成的紅三軍第九師（實際上只有一團人），⁹⁹移師潛江、天門一帶活動。¹⁰⁰就在這時，蘇區領導夏曦等人卻因九師的行動發生了一連串的爭論，以致引爆了隔年的肅反。

原來，在8月初，中央分局與湘鄂西省委（6月時成立）規定九師的行動是攻打沙洋後折回天門，造成天門的赤區。同時又指示九師如能與三軍取得聯繫時，須與三軍聯繫，但這是次要任務。隨後，九師便在省委委員萬濤、師長段德昌的領導下，向沙洋進發，並於8月中旬占領沙洋。此時，萬濤等人從敵人電報得知，紅三軍已到達南漳一帶，故決定九師繼續西向占領荊門，最後終於在9月底與紅三軍碰頭。萬濤當即開會，批評並撤銷鄧中夏的職務，自任三軍政委，然後就向東往天門、潛江一帶開拔，終於把紅三軍拖回蘇區。然而，當時中央分局書記夏曦卻相當震怒，說九師在占領沙洋後沒有立刻折回占領天門，是違反軍委會的決定。還大罵

⁹⁷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給中央的綜合報告〉（1931年7月26日），《湘鄂西文件》，第1輯，頁73。

⁹⁸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湘鄂西省委給紅三軍的信〉（1931年8月12日），《湘鄂西文件》，第1輯，頁86。

⁹⁹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給中央的報告〉（1931年5月10日），《湘鄂西文件》，第1輯，頁19。

¹⁰⁰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湘鄂西省委給中央的報告〉（1931年8月18日），《湘鄂西文件》，第1輯，頁88。

說：「不要提九師了，九師反革命了！」¹⁰¹當三軍回蘇區後，在夏曦的主導下，中央分局與省委共同決議撤銷萬濤紅三軍政委之職，並給予九師師長段德昌、政委陳培蔭各一個警告。但這使得紅三軍幹部非常不滿，原來當時中央分局罵三軍是反國際路線，三軍黨員因此反問：「爲什麼我們回來了，還是反國際路線呢？」另外，當時中央分局決定在紅三軍軍部上再成立一個軍委會，以便控制紅三軍。該軍委會由賀龍、夏曦、楊光華（省委書記）、彭之玉（省政府主席）、唐赤英（軍委參謀長）組成。¹⁰²這些人當中，楊光華是被夏曦提拔爲省委書記，唐赤英則是隨夏曦一同來到湘鄂西蘇區者，所以軍委會以夏曦的人馬居多。當時三軍內部人士反對此一安排，如段德昌就提出軍委要集體領導、軍委要增加有軍事學識和經驗的人（夏曦不是軍隊出身），以及加派三軍人材等要求，¹⁰³這顯然是針對夏曦而發。

爭論至此還未告一段落。在紅三軍回蘇區後，甫遭水災之患的洪湖根據地難以餵食數量如此龐大的紅軍，兼之國軍的圍剿，所以蘇區領導就究竟要不要打出蘇區之事發生爭論。據當時負責少共工作之宋盤銘所言，在一次潛江之役失敗後（此當指11月前後潛江地區爲國軍所占之事），夏曦就提出向外發展，主張紅軍主力到京山去，把鄂北地區作爲後方去創造新的根據地。¹⁰⁴

夏曦此一主張，難免有脫離後方根據地而向外發展之嫌一如同夏曦過去對紅三軍與九師的批評般。當時夏曦正隨賀龍在前線率領紅三軍向天門、漢川一帶出擊，留守後方洪湖蘇區的省委委員萬濤等人抓住這個

¹⁰¹ 〈湘鄂西萬濤關於九師行動的報告〉（1931年10月18日），《湘鄂西文件》，第2輯，頁129-132。

¹⁰²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致中央信〉（1931年10月16日），《湘鄂西文件》，第1輯，頁108-109。

¹⁰³ 〈湘鄂西萬濤爲九師行動問題致中央信〉（1931年10月25日），《湘鄂西文件》，第2輯，頁136。

¹⁰⁴ 〈宋盤銘關於湘鄂西情況給中央的綜合報告〉（1931年11月22日），《湘鄂西文件》，第1輯，頁122。

機會，於1931年11月召開省委擴大會議，大肆抨擊夏曦。據萬濤等人的說法，夏曦早在水災前就有紅軍離開蘇區的主張，他的猶豫動搖應為潛江之敗負責，並批評夏曦根本是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取消主義，紅軍中的幹部對夏曦的信仰都很低。¹⁰⁵會後，省委還為萬濤平反，說九師事件省委應負主要之責，因此，把一切錯誤歸咎於萬濤身上，還撤銷萬濤政委職權，是不正確的。¹⁰⁶至於鄧中夏事件，據鄧本人所言，他的錯誤前湘鄂西特委也脫不了責任。¹⁰⁷而與已故之周逸群共同負責前特委的萬濤則辯解說，如果前特委有錯，就是錯在太相信鄧中夏。¹⁰⁸整個事件，在萬濤看來，主要還是錯在鄧中夏。因此，由萬濤所掌握的省委乃要求中央撤銷鄧所有的工作，並進一步討論他的黨籍問題。¹⁰⁹

萬濤等人的行為著實令人匪夷所思。根據中共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下級必須完全服從上級的決議，即使有異議，也必須待黨員代表大會時再提出討論。此次九師事件，關於九師行動的決議是中央分局與省委於八月初所決定，九師卻在前線擅自變更原初決定的路線，這就犯了第一個錯誤。至於紅三軍回洪湖後，對於萬濤等人的處置也是由中央分局與省委共同決定，且中央分局是省委的上級，萬濤是夏曦的下屬，所以萬濤與湘鄂西省委沒有權力否決上級的決議，這是第二個錯誤。當時夏曦的愛人譚國輔在會場上便提出異議，認為省委會沒有權利批評中央分局的路線，何況夏曦並不在場。但與會的反夏曦派則認為夏曦也是省委之一，故會議當

¹⁰⁵ 〈中共湘鄂西省委給中央的報告〉（1931年12月3日），《湘鄂西文件》，第2輯，頁151-152。

¹⁰⁶ 〈中共湘鄂西省委關於九師行動結論的決議〉（1931年12月1日），《湘鄂西文件》，第2輯，頁149-150。

¹⁰⁷ 〈鄧中夏報告的總結〉（1931年12月8日），《湘鄂西文件》，第2輯，頁157-162。

¹⁰⁸ 萬濤：〈鄧中夏問題材料之二〉（1931年12月7日），《湘鄂西文件》，第2輯，頁154-155。

¹⁰⁹ 〈中共湘鄂西省委對鄧中夏同志的決議〉（1931年12月9日），《湘鄂西文件》，第2輯，頁165。

然有權利提出他的問題。¹¹⁰事實上，類似的情形在當時的鄂豫皖蘇區也曾發生，1931年8月鄂豫皖蘇區的主力軍紅四方面軍根據中央分局的指示自豫東南地區南下皖西地區之際，竟在途中私自更改原定路線，轉向鄂東地區發展。儘管紅四方面軍更改後的路線較原初的決定更符合實際，但這已違反了中共的組織原則，更不用說紅四方面軍在因此被鄂豫皖中央分局斥責以後還在下層到處散布對中央分局的批評了。¹¹¹這裡萬濤所以敢於否定並批評上級的決議，也許也是和紅四方面軍一樣，以為自己是據理力爭，所以他隨後也在幹部間散布批評上級的意見，在幹部間煽動清算夏曦及鄧中夏逃跑主義路線的情緒。¹¹²但是，問題的癥結並不在於哪一條軍事路線較符合實際，而在於這根本就是違反共黨組織紀律的行為。

在得知省委擴大會的消息後，夏曦急忙從前線趕回，並於1932年1月22-30日間，由中央分局在監利周老嘴召開了湘鄂西蘇區黨第四次代表大會。大會之初，以萬濤與潘家辰為首的反夏曦派仗著多數與會者贊同其意見，大肆抨擊夏曦，並建議同樣反夏曦的尉士均去中央報告爭論經過。中央在聽取尉的報告後，旋即派共青團領導關向應與尉士均一同回湘鄂西蘇區。然而，大出萬濤意料之外，中央並不贊同萬濤的作法，關向應來此的目的是要支持夏曦，而非萬濤。因此，在關抵達後，會議局勢為之逆轉，所有人把矛頭指向萬濤及潘家辰，潘家辰當場氣得昏倒。¹¹³大會決議，對於夏曦有所謂拋棄洪湖根據地創立鄂北蘇區的逃跑主義之指責是不對的，因為創立鄂北蘇區一事是段德昌的主張，夏曦只錯在沒有反對此一右傾的

¹¹⁰ 〈莊東曉關於湘鄂西蘇區情況給中央的綜合報告〉（1934年1月23日），《湘鄂西文件》，第1輯，頁367。

¹¹¹ 陳耀煌：《共產黨·地方菁英·農民：鄂豫皖蘇區的共產革命（1922-1932）》，頁350-352。

¹¹² 楊光華：〈湘鄂西黨的四大前後〉，《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第2輯，頁725。

¹¹³ 〈莊東曉關於湘鄂西蘇區情況給中央的綜合報告〉（1934年1月23日），《湘鄂西文件》，第1輯，頁368-369。

主張。另外，大會批評萬濤把向外發展新蘇區當作逃跑右傾的看法是庸俗的保守主義。¹¹⁴最後，湘鄂西省委重新作出決議，承認省委擴大會議與省委犯了錯誤，並指責萬濤與潘家辰的行徑是反黨的，只有幫助反革命的意義。¹¹⁵

隨後，湘鄂西蘇區即效法鄂豫皖蘇區的辦法，炮製一場血腥肅反。當時的鄂豫皖蘇區，在前述紅四方面軍於前線擅自改變原中央分局的指示後，也曾敦請中央裁決。但當時中共中央也同樣站在中央分局一邊，批評紅四方面軍的作法。隨後，鄂豫皖中央分局的領導張國燾即派人去把紅四方面軍拖回豫東南地區，並立即在軍中發動肅反，把那些帶頭反對中央分局的幹部，全部當成反革命改組派分子，一一予以殺害。而且在紅四方面軍回到豫東南地區後，張國燾還進一步把肅反向地方發展，把那些一直桀驁不馴、反抗上層的地方菁英，一併誅除。¹¹⁶鄂豫皖蘇區的經驗對於湘鄂西蘇區的影響相當大。據後來被當成反革命分子的莊東曉所言，尉士均陪同關向應回到湘鄂西時，還帶來了鄂豫皖蘇區的肅反材料。隨後，又有更多相關的材料來到，黨員與群眾皆被要求閱讀討論這些材料。不久之後，肅反就爆發了。¹¹⁷

與張國燾相同，夏曦最初也是從軍隊裡開始肅反，而且他們一開始都是從叛降或被俘國軍軍官找突破口（張國燾是以岳維峻劫獄事件為突破口）¹¹⁸。據夏曦及相關人士的說法，1932年5月間，在天（門）漢（川）

¹¹⁴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給中央的報告〉（1932年2月25日），《湘鄂西文件》，第1輯，頁148-149。

¹¹⁵ 〈中共湘鄂西省第四次代表大會政治任務決議案〉（1932年1月27日），《湘鄂西文件》，第2輯，頁219-220。

¹¹⁶ 陳耀煌：《共產黨·地方菁英·農民：鄂豫皖蘇區的共產革命（1922-1932）》，頁397-405。

¹¹⁷ 〈莊東曉關於湘鄂西蘇區情況給中央的綜合報告〉（1934年1月23日），《湘鄂西文件》，第1輯，頁370。

¹¹⁸ 陳耀煌：《共產黨·地方菁英·農民：鄂豫皖蘇區的共產革命（1922-1932）》，頁394-397。

縣一位被俘叛降之國軍軍官張錫侯陰謀叛變。¹¹⁹據調查指出，原來張與紅三軍第八師參謀長胡慎己勾結，胡與鄂豫皖蘇區的軍事領導許繼慎同樣是第三黨分子，他在1930年被派到湘鄂西蘇區工作，隨後被派任洪湖軍校教務長。原來該校早已成爲第三黨、改組派的反革命大本營，前校長劉先鳴等數人皆是反革命分子。另外，這些反革命分子還以同鄉關係進行聯繫。如胡慎己是四川人，他到洪湖時便帶來許多四川軍隊出身者一同打入紅軍內部。另外還有陝西人曾大慶、馬健山者，他們也從蘇區周圍陝西出身的部隊裡找來許多陝西人參加紅軍。據夏曦所言，川籍反革命分子是第三黨，陝籍則是改組派。兩派人馬大多是地主階級出身者，這就把肅反與階級鬥爭聯繫在了一起。¹²⁰

隨後，肅反即波及省委與地方。據夏曦所言，在沔陽、江南、天門等地方黨部皆破獲了反革命組織，其中被捕獲之反革命分子裡，著名者如石首的李良耀、華容的劉革非、沔陽的栩栩（許光炎），省委裡則有反夏曦派的領導潘家辰與莊東曉夫婦。其他反夏曦派領導，如萬濤、尉士均等人，最初並未被當成反革命分子，只是被指與反革命分子親密聯合，¹²¹但他們很快的也被當成反革命分子處置。就連已故的前湘鄂西特委書記周逸群也遭到波及，說他在1929年時重新起用沔陽的自首分子就是一起反革命的陰謀，還說他根本沒有死，而是跑到國軍裡爲國軍出計剿共。¹²²

這樣的指控難免荒唐，但夏曦想藉由肅反來整肅蘇區內部的反夏曦派則無庸置疑。無疑地，夏曦個人的因素是湘鄂西蘇區肅反所以爆發的重要關鍵。當時被夏曦提拔爲省委書記的楊光華便指出，夏曦所以發動九師事

¹¹⁹ 楊光華：〈罪惡肅反的起源及其實際經過〉，《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第2輯，頁730-731。

¹²⁰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夏曦關於肅反等問題給中央的報告〉（1932年7月8日），《湘鄂西文件》，第1輯，頁226-233。

¹²¹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夏曦關於肅反等問題給中央的報告〉（1932年7月8日），《湘鄂西文件》，第1輯，頁233-235、242。

¹²² 〈阿森關於湘鄂西蘇區一般情形的報告〉（1932年10月24日），《湘鄂西文件》，第1輯，頁257、327。

件，就是因為他想要把江南東山地區淪陷之責推到萬濤頭上（但楊對於萬濤在省委內搞反夏曦派別的作法也頗不以為然）。¹²³

除此之外，湘鄂西蘇區的肅反也牽涉到上層的派系之爭，如潘家辰與莊東曉夫婦的遭遇便是一個例子。潘、莊二人皆是留俄歸國黨員，潘的俄文能力很高，據云：1927年初共產國際代表米夫來華之際，最初就是挑選潘作為其貼身翻譯，但因為王明在背後搞鬼，在米夫面前說潘的壞話，米夫才用王明替代潘家辰。¹²⁴後來，潘回到俄國。據王若飛夫人李培之的回憶，王若飛在六大後申請進入列寧學院，但瞿秋白請潘家辰向考試委員會指控王若飛是陳獨秀派，沒有資格進這個學校，¹²⁵可以猜測潘家辰與瞿秋白走得較近，他也可能是隨瞿秋白一起在1930年下半年回國。後來，潘、莊被派到湘鄂西蘇區工作，中共中央在潘家辰的介紹信上指出，潘對立三路線動搖，回國後表現膽小，要中央分局注意他。¹²⁶此時的中共中央是由王明等國際派領導，夏曦整肅潘家辰，當然與國際派欲整倒瞿秋白派，或王明與潘家辰間的私人恩怨不無關係。後來夏曦在指控潘家辰與莊東曉時，便追溯到他們在蘇聯時曾是托洛茨基派一事，難免有翻舊帳的嫌疑。

另外，筆者以為，一九三〇年代前期中共各蘇區內部所以爆發大規模的肅反，與各該蘇區內部長期以來即存在的矛盾也不無關係。如鄂豫皖蘇區與湘鄂西蘇區所以都是從叛降或被俘軍官找突破口，實際上正反映了紅軍內部成份混雜的這一事實。此種情形在湘鄂西地區尤其嚴重。如賀龍的

¹²³ 楊光華：〈湘鄂西黨的四大前後〉，《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第2輯，頁722-725。

¹²⁴ 莊東曉：〈從莫斯科中山大學到洪湖蘇區〉，《洪湖文史》，第2輯（洪湖，1986年），頁48。但據鄭超麟回憶，在武漢時，米夫有一次叫潘家辰請他去說話，可見潘家辰還是在米夫身邊侍候。鄭超麟：《鄭超麟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年），頁258。

¹²⁵ 李培之：〈飛渡關山的人——回憶王若飛同志〉，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關山渡若飛》編輯組編：《關山渡若飛：王若飛百年誕辰紀念集》（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頁524-525。

¹²⁶ 〈潘家辰致中央信〉（1931年5月9日），《湘鄂西文件》，第1輯，頁16。

軍隊原來許多就是舊軍隊或地方會黨出身者，像是夏曦所指責紅軍內部的川籍第三黨，賀龍在湘鄂邊地區時便收編了不少川籍軍隊，如他與鄧中夏在1931年初率軍隊西走湘鄂邊地區時，便收編了甘占元等人領導的川籍軍隊，其中不少人還與哥老會有關係。¹²⁷這些舊軍隊與會黨出身者的不穩，是可以想像的。早在夏曦於洪湖蘇區發動肅反前一年，湘鄂邊蘇區便已開始整肅舊軍隊、會黨出身之不穩分子。在1931年4月賀龍、鄧中夏率紅二軍團離開湘鄂邊後，留下周小康主持湘鄂邊特委。周不久後即發動肅反，先是以勾結地主團防的罪名殺了會黨出身的賀龍舊識谷德桃，¹²⁸1932年初又在鶴峰發動肅反，殺了長陽游擊隊隊長田韻濤等人。¹²⁹不久後，賀的舊部賀佩卿、賀炳南等人發動政變，要殺周小康。據說賀佩卿等人所以加入紅軍，原來就只是出於賀氏的家族和氣與「入股作官」的野心，而不是什麼「為著勞苦大眾的翻身解放」。由於環境的愈益嚴苛，地方觀念的衝突（賀佩卿等人要殺周小康等來自洪湖地區的「江北人」），以及以為周小康要解決他們，終於爆發了政變，導致湘鄂邊地區的瓦解。¹³⁰

因此，說夏曦發動肅反的動機是為了整肅紅軍內部的不穩分子，並非空穴來風。被夏曦作為肅反突破地區的天漢縣，這裡紅軍的地方游擊隊原來就是一群烏合之眾，其中漢川縣的游擊隊，最初原來是由地方黨員王禮欽（後來被調到鄂西去槍斃）所領導行徑類似土匪的隊伍。1930年時該游擊隊因為政府當局的圍剿，「不管三七二十一」就逃到沔陽，留下來的一些人只知道弄錢和調戲女人，更不用說他們還打著「護黨救國軍」的旗幟

¹²⁷ 蹇先任：〈桑鶴歲月〉，人民出版社編輯：《革命回憶錄》，第4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28-32。

¹²⁸ 蹇先任：〈桑鶴歲月〉，《革命回憶錄》，第4輯，頁40-42。

¹²⁹ 獵人：〈湘鄂西紅軍游擊紀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第2輯，頁696。

¹³⁰ 蹇先任：〈桑鶴歲月〉，《革命回憶錄》，第4輯，頁50-51；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史編寫組：《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史》，頁389-390。

了。¹³¹兼之天漢縣是前線地區。在這種地方說這類土匪似的隊伍及黨員和敵對白軍方面發生了什麼勾結，倒也不那麼令人訝異。

再者，夏曦指某些如沔陽自首黨員般不穩與犯錯誤的地方黨員為反革命分子，這也不是夏曦的發明，如周逸群領導時期的湘鄂西特委就已把沔陽某些自首黨員當成反革命分子予以殺害。另外，當時用來評價一個人是否為反革命者的標準是他對於反富農路線的態度。原來在夏曦來到湘鄂西蘇區後，中央分局便立刻開始發動反富農鬥爭。¹³²然而，直到肅反前夕，中央分局仍認為反富農鬥爭未被貫徹。有些地方刻意隱瞞富農的土地，有些地方則發生過當行為，乃至於走到消滅富農、綑綁吊打逼死富農，並因此嚇跑了中農。¹³³事實上，這類過與不及的行為，在各蘇區內也相當常見，他們可以被當成左、右傾機會主義的行徑，也可能被指為反革命的舉動。如在夏曦剛來到湘鄂西蘇區之際，當時中央蘇區便發生反富農過當之情形，其中毛澤東甚至還提出「從肉體上消滅所有富農」的口號。當時共產國際便提醒蘇區領導，這種行為很容易被改組派等反革命分子利用。因為這些分子會利用「左」的口號滲入到蘇維埃內部。¹³⁴當然，把這些反富農鬥爭中過與不及的情形歸咎於反革命分子的行動，難免牽強。不過，可以推測的是，用肅反的手段來處置這些地方上不穩與違背上層路線的分子，其目的無非就是為了加速蘇區內部的階級鬥爭與分化，並進一步加強黨對地方的控制。

1932年10月，夏曦、賀龍領導的紅三軍由於不敵國軍，被迫放棄洪

¹³¹ 〈中共湖北省委給中央的報告〉（1930年2月25日），《湖北文件》，第7輯，頁43-46；〈中共漢川縣委向省代表大會的報告〉（1930年4月14日），《湖北文件》，第10輯，頁254-263。

¹³²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關於土地問題及反富農鬥爭的決議〉（1931年5月14日），《湘鄂西文件》，第1輯，頁30-34。

¹³³ 〈中共湘鄂西省委報告〉（1932年2月25日），《湘鄂西文件》，第2輯，頁251、255。

¹³⁴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31年3月28日），《國際文件》，第10輯，頁201。

湖蘇區，經鄂、豫、陝邊界，最後抵達湘鄂邊地區。一路上，夏曦仍不斷的進行內部肅反。他在轉移途中先是發動了第二次肅反，被整肅者中有七師師長王一鳴與湘鄂西軍分會參謀長唐赤英。在抵達湘鄂邊後，他又先後發動了第三、四次肅反，殺了九師師長段德昌，九師政委宋盤銘等人。這些肅反，可能如賀龍所說般，是因為夏曦怕結仇，不得不繼續殺人。¹³⁵但也不能不說是肇因於軍事失敗致使原本成份便甚為混雜的紅軍紀律更加敗壞，而夏曦、關向應、賀龍等黨政軍領導為加強對紅軍的控制，不得不出此下策。根據中央分局後來的報告，第二次肅反發動前，軍隊每天都會發生丟槍、叛逃之事，甚至沿途搶掠，破壞了階級路線；第三次肅反則是發生在1933年3月桑植之敗後，當時蘇區內部發現「立即回洪湖去」、「山上不能建立蘇區」的口號；第四次肅反則是緊接著第三次肅反之後，據說這是因為發現宋盤銘等人勾結施南保安團才發動的。¹³⁶另外，段德昌的被處死，當然也與他過去和萬濤站在一起反對夏曦不無關係。然而，由於缺乏資料，我們無法詳細探究第二至四次肅反的概況，也無從追述每個被害者的身分及其過去的經歷。但可以推測的是，湘鄂西蘇區肅反的發生，與夏曦等人為整肅異己，加強對黨政軍的控制決不是沒有關係。

陸、結 論

當然，藉由肅反這種非常手段來加強對黨政軍的控制，難免血腥殘酷。據說，當紅三軍從洪湖撤退時，夏曦趕著處決所有的反革命分子，來不及的就用麻袋裝著往湖裡沉。¹³⁷原來是夫妻的莊東曉與潘家辰，在被逮捕後也

¹³⁵ 〈賀龍關於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間湘鄂西紅軍及革命根據地的若干問題的談話〉，《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第2輯，頁661。

¹³⁶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給中央的報告〉（1934年9月15日），《湘鄂西文件》，第1輯，頁426-429。

¹³⁷ 楊光華：〈罪惡肅反的起源及其實際經過〉，《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第2輯，頁736。

反目成仇，互指為反革命，其中莊東曉還要求親審並槍斃潘家辰。¹³⁸甚至莊東曉在五十年後回想起此事時，仍不敢說明她與潘家辰的關係，只淡淡的說她曾意外的見到潘家辰，看到潘想用碗裝水，水未倒成，原來他的手已經因為被用刑而不聽使喚了。¹³⁹另外，根據湘鄂西中央分局的統計，在第一次肅反中，共有千餘位反革命分子被逮捕，其中有百數十人被處死。在1932年7月後所推動的第二至四次肅反中，共逮捕了六百四十九人，並處死其中一百一十一人，另有二十八人病死。¹⁴⁰此一數據雖比不上其他蘇區的「成果」（閩西蘇區在半年內就殺了不下二千名社會民主黨反革命分子），¹⁴¹但仍不能不讓人咋舌。而夏曦仿倣張國燾殺了如此多的人，卻不能像張國燾般在肅反後還打了幾場大勝仗，反而節節敗退，最後還丟了蘇區，如此也就難怪眾叛親離，還有夏曦在1936年2月渡河落水時無人願意施予援手致死的傳言了。

儘管如此，我們仍不能不說，肅反是被作為加強對黨政軍領導的一種手段，其本身也蘊含了階級鬥爭的意義。陳志讓從湘鄂西地區的客觀環境推論共黨並不是藉由土地革命的口號去動員農民，因此否定了該地區共產革命運動中所存在的階級鬥爭，這是錯誤的。蓋如贛南、閩西等租佃制度盛行的地區，地方共產黨員最初也是像賀龍一樣利用其個人魅力及私人關係與影響力去動員農民，而不是訴諸土地革命的口號。至於在湘鄂西地區，即使該地區以自耕農居多，但共黨在1930年以後確實也曾在該地推動土地革命。況且，階級鬥爭並不只是以土地革命的方式呈現出來，中共在肅反的過程中，經常把反革命分子與地富階級聯繫起來，這就是一種階級鬥爭的表現。

¹³⁸ 〈莊東曉關於湘鄂西蘇區情況給中央的綜合報告〉（1934年1月23日），《湘鄂西文件》，第1輯，頁372-376。

¹³⁹ 莊東曉：〈歷史教訓要講清楚〉，《湘鄂西風暴—監利革命歷史回憶》，頁98。

¹⁴⁰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給中央的報告〉（1934年9月15日），《湘鄂西文件》，第1輯，頁429-430。

¹⁴¹ 陳耀煌：〈中共閩西蘇區的發展及其內部整肅（1927-1931）〉，《國史館學術集刊》，第4期（臺北：國史館，2004年9月），頁67。

確實，與其他蘇區比較下，湘鄂西蘇區具有其特點，但決不是如陳志讓所主張般，在於湘鄂西蘇區未曾推動土地革命，而其他蘇區則反之，也不是在於其他蘇區的地方黨員未如賀龍般利用其個人魅力、關係及影響力等傳統手段去動員農民。相反的，筆者以為湘鄂西蘇區的特徵正在於它對於地方黨員個人力量及關係的依賴程度，不如其他蘇區為甚。確實，在湘鄂西蘇區中心赤區的洪湖根據地，早期菁英家庭出身之黨員，他們最初也是如賀龍般，利用其個人魅力及關係去動員農民。但1929年以後，這些菁英黨員許多遇害或脫離革命，所以地方幹部力量並不強大，蘇區黨領導事實上也不是掌握在他們手裡。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在1929年以後湘鄂西蘇區發展的過程中，並沒有如鄂豫皖蘇區般，發生地方菁英黨員陰謀暗殺外來上層領導的商城事件；也沒有像中央蘇區般，當朱、毛率領紅軍出征湖南時，有地方菁英黨員敢於率領軍隊發動兵變，綁架省蘇委員；更沒有像1931年閩西蘇區的肅反般，因為傅柏翠等影響甚鉅的地方菁英黨員的叛變，導致整個蘇區的崩潰瓦解。當然，這不是說湘鄂西蘇區不存在這類問題，如1930年在沔陽自首事件中被當成反革命分子殺害的沔陽縣委領導樵人便是一位在地方黨員與群眾間甚有威望的地方幹部。不過，與其他蘇區比較下，湘鄂西蘇區內部本土與外來幹部間衝突的問題並不如其他蘇區般嚴重。因此，在一九三〇年代初期各蘇區的肅反大都以地方黨員為其主要整肅對象時，湘鄂西蘇區的肅反卻是肇因於外來幹部夏曦與萬濤等人間的衝突，並且其整肅對象也不是以地方幹部為主。這樣的差異告訴了我們，湘鄂西蘇區如果與其他蘇區間存在著什麼不同之處，決不是如陳志讓所說的般，在於該蘇區較其他蘇區更多的依賴地方黨員個人的魅力與某些傳統的私人聯繫，而應該是相反的情形。

徵引書目

(一) 檔案史料彙編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輯》，第3-5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年。

中央檔案館、湖北省檔案館編：《湖北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3、5、7、10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文中簡稱：《湖北文件》。

中央檔案館等編：《湘鄂西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彙集》，第1-4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文中簡稱：《湘鄂西文件》。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第7、9、10輯。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文中簡稱：《國際文件》。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各地武裝起義—湖南地區》。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

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第1-2輯。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

(二) 回憶錄

人民出版社編輯：《革命回憶錄》，第4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本書編輯組編：《關山渡若飛：王若飛百年誕辰紀念集》。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

中共監利縣委黨史資料征編委員會辦公室主編：《湘鄂西風暴—監利革命歷史回憶》。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1986年。

雷嘯岑：《憂患餘生之自述》。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2年。

鄭超麟：《鄭超麟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年。

(三) 縣志

公安縣志編纂委員會：《公安縣志》。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0年。

(四) 中文專書

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

陳耀煌：《共產黨·地方菁英·農民：鄂豫皖蘇區的共產革命（1922-1932）》。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2年。

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史編寫組：《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史》。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劉正崗主編：《沔陽人民革命史》。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89年。

(五) 期刊論文

朱德源：〈土地革命年代的傅家灣人民〉，《洪湖文史》，第3輯（洪湖，1988年）。

莊東曉：〈從莫斯科中山大學到洪湖蘇區〉，《洪湖文史》，第2輯（洪湖，1986年）。

陳耀煌：〈菁英與群眾：北伐前後閩西地區的國共合作與農民暴動〉，《新史學》，第14卷第1期（臺北，2003年）。

陳耀煌：〈中共閩西蘇區的發展及其內部整肅（1927-1931）〉，《國史館學術集刊》，第4期（臺北：國史館，2004年9月）。

賀龍：〈回憶紅二方面軍〉，《近代史研究》，總第7期（北京，1981年）。

顏穎：〈李伯岩喪命記〉，《洪湖文史》，第4輯（洪湖，1988年）。

(六)英文著作

Bianco, Lucien, *Peasants without the Party: Grass-Root Movemen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Armonk, N.Y.: M.E. Sharpe, 2001.

Chen, Jerome, *The Highlanders of Central China: A History, 1895-1937*. Armonk, N. Y.: M. E. Sharpe, 1992.